

戴乃迭《中国文学》译介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肖娴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广东 茂名 525000)

[摘要]生态翻译学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或者选择翻译生态环境的行为。作为一种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方法,它从有别于传统翻译理念的全新视角对翻译作系统的探讨。从生态翻译学的翻译生态环境、译者中心、多维度适应/选择等角度,解读翻译家戴乃迭在英文期刊《中国文学》数十年的译介活动及翻译成就。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戴乃迭;《中国文学》;译介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14.01.023

[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4)01-075-04

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翻译研究的新视角“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胡庚申,2004),作为生态途径的翻译研究(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生态翻译学使我们能够从整体上了解译者的主体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语言选择和文化定位,以及译者对具体翻译生态环境的多维度适应/选择等。本文拟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基础,从翻译选材、译者中心、以及翻译策略的多维度适应性选择等方面来解读翻译家戴乃迭在为英文期刊《中国文学》服务的数十年内的译介活动、译作和翻译成就,旨在说明戴乃迭译介活动是她在所处翻译生态环境中适应外部需求和表达内心需要进行选择的结果。

一、翻译选材与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生态环境是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语言环境的总和(方梦之,2011)。戴乃迭(Gladys Yang)在她近半个世纪的翻译生涯中,翻译过从先秦文学到当代文学的海量作品,早期的翻译以和丈夫杨宪益先生合译为主,而戴乃迭的大部分译作,尤其是独立翻译的作品多是在50年代到80年代末作为英文期刊《中国文学》的主要译者之一期间完成的。因此,可以说戴乃迭把毕生的大部分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文学》,而这本新中国第一份面向海外读者系统地翻译、介绍中国文学发展动态的国家级刊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程度地受到外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因此,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翻译生态环境极大地制约了她在原作选材上的自由度。

《中国文学》创刊于1951年,在它存在的半个世纪里,一直是英法语世界读者了解中国文化、文学、艺术的一个重要窗口。创刊之初,《中国文学》

主要向国外宣传、译介建国以来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反映新中国的社会新风貌,同时也介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以配合政治外交的需要。《中国文学》杂志社(1986年正式更名为中国文学出版社)由外文局与作协共同领导,译介的文学作品的选定甚至不征求作者的同意,作为翻译发起人与赞助人的政府机构在翻译作品选择上有更多话语权,而作为主要译者之一的戴乃迭并不能按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原作。据杨宪益先生回忆,有一篇小说写得很好,幽默不失情趣,乃迭也翻译得很妙,但碰巧当时毛主席刚发表“我们不当怕鬼”(指外国帝国主义)的谈话,于是这篇有关鬼故事的译文只好删掉(杨宪益,2001)。可见,受到政治需求、文学思潮、文艺政策、外交需要等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制约,翻译家在翻译选材上也必须做出相应的适应性选择。

正如罗森纳·沃伦所言,文学作品的翻译就像“把植物或动物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他们必须向个人或民族的‘适应’和成长那样,只有适应新环境而有所改变才能生存下来”(Warren,1989),纵观戴乃迭在《中国文学》的译介轨迹,就是她对受社会、政治、经济大翻译生态环境影响而进行适应/选择的不断成长、成熟的过程。按时间分期,戴乃迭的翻译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为兴趣而译的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为生计而译的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为国家而译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其中,戴乃迭主要的译作和翻译成就集中在50年代到60年代和80年代这两个时间段,而这两个时期,她的主要作品几乎都发表于《中国文学》。

出生于英国传教士家庭的戴乃迭,自幼热爱中国文化。她于1940年随先生杨宪益来到了当时战乱频仍的中国。就翻译活动来说,这一时期她的翻译选材多从二人兴趣出发,较少受到外部翻译生态环

[投稿日期]2013-10-20

[作者简介]肖娴(1982-),女,湖南双峰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境的制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痴迷成为他们“中西合璧”翻译古典文学作品的最初动机。她在未完成的自传中说:“不同于许多外国友人,我来中国不是为了革命,也不是为了学习中国的经验,而是出于对杨宪益的爱、我儿时在北京的美好记忆,以及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仰慕之情”(杨宪益,2003)。戴乃迭早期的翻译与杨宪益合译的比较。杨宪益原来对古典文学和历史有更大兴趣,而非翻译,为了可以和夫人戴乃迭在一起工作,就到了编译馆做翻译。他认为夫人戴乃迭才是真正的翻译家,一般是他把初稿翻译出来,交给戴乃迭加工,她费的力气更大(刘晋锋,2005)”。这一时期的主要译作包括《老残游记》、《资治通鉴》等,现代文学作品包括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

戴乃迭真正走上职业化翻译道路则是在第二个时期。1952年,夫妇俩加入刚成立不久的外文出版社,这一时期他们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非常不理想。译作中,包括小说、戏曲、古典诗词、传奇、评话、诗歌、喜剧、散文、古典文论、文学史、中外文化交流等。在当时,负责选稿提供待译作品的是中文部,主编负责审稿,外文部负责翻译。用杨宪益先生的话来说,他们只是“受雇的翻译匠”而已,选取的作品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和外交的需要,有很多作品在他们看来都“不值得为它们浪费时间”(杨宪益,2001)。在这期间他们翻译了后来奠定他们在翻译界地位的,在中国翻译史上都能算得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的《红楼梦》,但杨宪益曾坦言他对《红楼梦》并无多大喜好。在由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赞助人等组成的相互联系的整体翻译生态环境中,他们的翻译选材明显受到来自各个领域的官方规范的制约,20世纪50到70年代这段时间,中国大陆红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是“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红楼梦》被看作是一本有关政治斗争的著作,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Yang et Gladys, 1994)。在这样的背景下,译者的翻译选材可以说是一种权力话语制约下的活动,可以译什么,必须译什么都不由译者自己决定。这期间也有比较特殊的例子。60年代初期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比较宽松的时候,《中国文学》连载了戴乃迭摘译的沈从文的《边城》(李晶,2010),作家和作品都是译者欣赏的,其翻译质量也非常高。

80年代是戴乃迭独立翻译作品的一个高峰。80年代,杨宪益担任《中国文学》主编以后,《中国文学》开始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期间,戴乃

迭在翻译选材上有了更多的自由,她独立完成了许多反映改革开放新成就和新时期文学思潮(比较典型的有:反思文学、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的译作,这是她译介活动的集大成时期。十年间她在《中国文学》发表的译作包括新风霞、古华、李广田、沈从文、张洁、张贤亮、邓友梅、张辛欣、谌容、王安忆、残雪等诸多新时期著名作家的作品。其译作之丰富,令人惊叹。与丈夫杨宪益先生主译古典文学作品相比,戴乃迭更多地译介当代文学作品,其中古华的作品因戴乃迭的译介在海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翻译选材是译者个人兴趣、价值取向以及翻译思想的综合反映,在不能自由选择原作的翻译生态环境下,译者是在对翻译生态环境作出适应选择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翻译工作的,在译者的适应选择过程中,译者“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许建忠,2011)。戴乃迭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翻译生涯中,反感甚至抵触一些索然无味、仅仅充当政治工具的作品,是译者操守的表现,是为“有所不为”;而她在新时期努力翻译自己喜欢的,能为西方读者打开观察与思考中国文学与文化窗口的作品,是为积极适应/选择翻译生态环境的“译有所为”。

二、“译者中心”

翻译生态学认为,翻译行为是译者主体意识与主导作用相结合的结果。译者处于不同语言 and 不同文化间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交互点上,即“译者为中心”,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的个人能力、艺术修养、价值取向等,影响着译文的质量和风格。首先,戴乃迭热爱中国文化,有很好的文学素养,且早年受丈夫杨宪益先生的影响,二人中西合璧的翻译也为他们产生高品质的译作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其次,作为女性翻译家,戴乃迭在八十年代独立译介新时期文学时,重点译介了新风霞、宗璞、戴厚英、遇罗锦、谌容、张洁、王安忆等女性作家的作品,还在译作后撰写评介文章着重介绍她们。译者戴乃迭从自身需要和兴趣出发,对女性作家的生存状态与创作有更多的关注,这与戴乃迭女性翻译家的身份不无关系。戴乃迭的翻译不仅将原文忠实地传译给读者,其中更体现了她个人对文学、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她在翻译完谌容的《人到中年》后提出了自己对小说中人物的看法,“陆大夫不同于中国文学中一般的女主人公…她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专业人才的典型代表。她把对祖国的满腔热爱都蕴含在不求回报的辛勤工作中…”(Gladys, 1981)。戴乃迭对女性作家的人文关怀主要体现在她的评价

文章中,她从中西比较文化的视角客观地向西方介绍中国,介绍中国女性作家这一新兴群体的风貌。她指出女性作家要腾出时间、精力来写作,比男性作家不知困难多少。而且,“作品引起的‘非议’”“对她们私人生活的流言蜚语”(Gladys, 1985),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女性作家来说,也是一种沉重的桎梏。

三、翻译策略的多维度适应性选择

生态翻译学将翻译方法解释为“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下,进行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三维”转换(胡庚申, 2011)。为了更好地从翻译生态学的角度了解戴乃迭的译作,下面拟从戴乃迭部分译作中对翻译策略的多维适应举例说明。

例 1. “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古华, 1983)

“…You have to dirty your hands to make money.”

例 2. 他们养了个好女儿啊,要从米箩里跳到糠箩里(古华, 1983), …

“This pretty daughter they raised in a rice bin wanted to jump into a bin of husk.”

例 3. 报纸上一个劲地提醒人们警惕走资派舍车马保将帅的诡计…(王蒙, 1991),

The papers kept issuing warning to beware of capitalist-roaders who victimized subordinates to save their own skin.

翻译是语言所负载的两种文化之间的传递与阐释。作为译者,势必要通过语言、文化和交际维度的适应与转换来达到交际目的。例 1 中原作的谚语在英语中同样翻译成谚语“you have to dirty your hands to make money”,准确地传达了原作的意旨,但由于两种语言的差异,汉语更强调直觉与意象,用“马无夜草不肥”与前半句形成生动的类比,而英语重理性、逻辑与求简,译者选择了归化手法,将“马无夜草不肥”隐去,原文文学意味有所减损,但译文明白晓畅。例 2 中的“米箩”与“糠箩”体现了原汁原味的中国农耕文化特点,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译文“a rice bin”与“a bin of husk”也容易为西方读者所理解,且保留了原文的语言结构与风格,译文形象而传神。例 3 中的“丢车马保将帅”是中国象棋文化的衍生词,在英文中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表达,译者从交际目的出发,对文化维度做出了适应性选择,意译成“victimized subordinates to save their own skin”。

以上只是戴乃迭浩如烟海译作中的少数几例,而戴乃迭为了忠实地介绍中国文化,在她的绝大多数译作中都体现出一种“不虚美、不隐善的文化立场”(杨宪益, 2003),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译介事业中,戴乃迭都努力向西方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即便是在受制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翻译生态环境中也是如此。西方译者对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存在误读,在文学作品翻译上也有滞后与偏见,而戴乃迭了解中国社会,以她自己独立的文化立场来解读中国文化和文学,将一个长期处于西方话语阴影下被隐匿的中国文学真实面貌还原给世界。

戴乃迭在与中国文学结缘的翻译生涯中,在其译作选材、对外部和自身需要的适应以及翻译策略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都可以用生态翻译学的相关理论来诠释。通过翻译生态学这一新视角,可以让我们对戴乃迭在中国文学、文化域外传播与译介的成就有更深更全面的了解。

参考文献:

- [1] Chinese Literature. Forty Years of Chinese Literature[J]. Chinese Literature, 1991(3).
- [2] Warren, R. The Art of Translation: Voices from the Field[M].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9.
- [3]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A Dream of Red Mansions[Z].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4:3.
- [4] Gladys Yang. A New Woman Writer Shen Rong and Her Story “At Middle Age” [J].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1981(4).
- [5] Gladys Yang. Women Writers(an edited version of a translation script of a talk given at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in November, 1983)[J]. London: China Quarterly. Sept. 1985.
- [6] Gu Hua, Tr Gladys Yang. Pagoda Ridge. Chinese Literature[J]. 1984, Summer:161-251.
- [7] Wangmeng. Tr Gladys Yang. The Butterfly and Other Storie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83.
- [8]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 中国翻译[J]. 2011(2):5-9.
- [9] 方梦之. 论翻译生态环境[J]. 上海翻译, 2011(1):1-5.
- [10] 胡庚申. 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J]. 中国翻译, 2004(3):11-16.
- [11] 杨宪益. 漏船载酒忆当年[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1:190, 191.
- [12] 杨宪益. 我有两个祖国——戴乃迭和她的世界[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责任编辑 王云江]

(下转第 95 页)

理。为了鼓励和激发同学们的学习热情, 教研室还自制奖状给网站制作优秀的团队颁发项目优秀奖。

总之, 通过 CDIO 项目教学, 同学们计算机基础课程的结课成绩有了明显提高, 据统计每班优秀率为 40%左右, 尤其是项目成绩每班优秀率约为 90%。

六、结束语

我校应用 CDIO 教学模式改革计算机基础系列课程的实践只有四年的时间, 且在大学一年级学生中进行, 同学们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有效地提高了动手能力和利用计算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计算机基础教学过程中, 学生对基于 CDIO 理念的项目学习课程模式表现了很高的学习热情, 对项目的运作过程有了亲身体验, 锻炼了多方面的能力, 尤其提高了沟通和协作能力。可以

预期, 通过教学模式的改革, 学生对后续课程的学习会有很大的帮助; 经过项目实训的毕业生会在人生之路中走得更远。

(其他参研人员: 薛红梅, 魏红君)

参考文献:

- [1] 申艳光, 刘志敏. 大学计算机基础项目教程[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 [2] 宁振刚, 刘志敏. 大学计算机基础实验实训[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 [3] 宋爱平. 优化实践教学提高学生创新能力[J]. 中国大学教学, 2005(10):36-37.
- [4] 张贵伟. 基于大工程理念的河北省工科院校师资队伍队伍建设初探[J].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2):71-74.

[责任编辑 王云江]

Textbook reform and practice of computer basic cours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DIO

LIU Zhi-min, NING Zhen-gang, SHEN Yan-guang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03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laborated the CDIO engineering education concept, training program and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of computer basic course and how to combine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the training of students' application ability. Through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of computer basic course, the author helps students set up the CDIO engineering education thought from they starting school, and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students to study follow-up courses. So that university-trained talent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Key words: CDIO; engineering education philosophy; training programs; textbook reform; teaching effectiveness

(上接第 77 页)

Gladys' translations for Chinese Literature—An eco-translatology Perspective

Xiao Xia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Petrochemical Technology, Maoming 525000, China)

Abstract: Eco-translatology defines translation as the translator's adaptive choices of the 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 Eco-translatology differs from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ies because of its systematic and brand new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is to study Gladys Yang's translating works and achievements as a translator i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 translator-centeredness and multi-dimensional adaptive choices.

Key words: eco-translatology; Glays Yang;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